

敦煌《书仪镜》写本 S.6111+S.10595 考释*

杜 海

敦煌文献中《书仪镜》写卷保存有 S.329、S.361、S.9713、S.6111、S.10595、P.4784 共 6 个卷号。S.9713+S.329+S.361(以下称作“甲本”)为同一写卷断裂而成的三个残卷的拼接,赵和平、郝春文等先生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细致的研究^①。S.6111+S.10595(以下称作“乙本”)是同一写卷断裂成的两个残片的拼接,由于仅保存 20 余行,学界未曾对此乙本有过校录研究。在校读原卷时,我们发现仅保存 20 余行的乙本是一件抄写质量较高的写卷,保存下来的书仪残文,有许多内容可以校正甲本。现将乙本录文如下:

- 1 理常也,他_夕
- 2 西路抄贼相仍^①,严_口雪寒山
- 3 归京辇,深夕许夕此夕有限^②,不由披_翼
- 4 使至奉问,下情不胜悚恋,孟冬渐寒
- 5 动止万福。某乙蒙恩,伏计乍到极边,悬_远
- 6 至于下情,倍恋恒百(日),比者将为使遇,中
- 7 愿体怒(怒),不审官军更有何消息,此
- 8 拜奉,但增恋结^③,谨因使不具。使至辱书,
- 9 清畅,某乙诸并寻常,仰知 中丞_未
- 10 能云^④,有限,未卜披展,增以延望。谨因
- 11 未远,行李如何? 秋深转凉,惟 公清
- 12 若筹料^⑤,以保万全。珍夕重夕,未
- 13 谨状。 使至枉书,豁如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敦煌书仪文书校注》(10YJC770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43-304页。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5-83页。

- 14 []某乙罪酷,痛深奈何 []
 15 []雪险途远,凄然有 []
 16 []披拜,但深驰结,谨因 []
 17 []奉书问及^[6],不胜悚恋,孟冬 []
 18 []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权知监后 []
 19 []而还,快跃无喻,实以 天恩远被,二兄 []^①
 20 雄,群戎荡涤,自己降则刁斗不击,衡轡自架 []
 21 胡无东顾之心,在四镇中, 圣上罢西轸之。 []
 22 如是言哉,寻于路旁拜庆,谨遣卒某乙将^[7] []
 23 鞋履等奉状先贺^[8] []^②

注释:

[1]西路抄贼相仍:甲本“仍”作“伋”,“伋”是“仍”的俗写。

[2]深々许々此々:甲本“许”误作“评”,“此”字后没有标记重复。“深许此”即表示“恳请(您)理解、原谅”,重复用来加强语气。

[3]但增恋结:“结”字,甲本漏抄。

[4]能云:甲本“云”误抄作“之”。

[5]筹料:甲本“料”误作“科”。

[6]奉书问及:甲本“书”误作“少”。

[7]谨遣卒某乙将:此六字左半边残损严重,据甲本及残存笔画录。

[8]奉状先贺:此四字左半边残损严重,据甲本及残存笔画录。

如果仔细阅读原卷,可以发现乙本抄写工整、语言流畅,现存文字无再次修改的痕迹,且许多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校正甲本之误。此外,乙本为数不多的错误,在甲本中却同样出现,如乙本第7行“体怒”,甲本同样抄作“体怒”,应该作“体恕”。乙本第6行“倍恋恒百”,应是“倍恋恒日”的误抄,而甲本亦作“倍恋恒百”。同时,甲本中有许多漏抄后又加“增补符号”补上的字,如“乍到极边”的“乍”字、“比者将为使遇”的“将”字、“某乙不才”的“不”字,乙本中这些字句都是完整的且与甲本补抄之后的字句相同。甲本背面有很多杂写年份,其中,最晚的年份是乾宁二年岁次乙卯(895),可知文书正面书仪的抄写时间不晚于乾宁二年(895)。乙本背面存“广德”字样。可以推断正面书仪抄写时间不晚于唐广德年间(763-764),那么乙本的抄写年代在甲本之前。

乙本寥寥150余字,却校正了甲本包括误抄、阙漏在内的许多错误,实属难得,所以我们推测甲本抄写过程应当参照了乙本。乙本最后一行的“鞋履”,

①乙本第1-19行为S.6111正面内容,见《英藏敦煌文献》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②乙本第20-23行为S.10595正面内容,见《英藏敦煌文献》1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甲本中作“鞋袜”。或许甲本抄写过程中为了书写方便而做简化,抑或是甲本抄写过程中另有所本。根据原卷对照虽不能绝对肯定甲本以乙本为抄写底本,但至少可以看出甲本抄写的底本与乙本属于同一抄写系统。

为了进一步说明两卷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书仪镜·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一封“答书”存在的问题。下面是学者对这一部分的录文:

“他乡万里,知我者希,惟二三贤不离心目。加以闻丞,不奉音耗,西路抄贼,相伋严[?]。答:雪寒山闭,途绝进退,仿佛改年,不知何当得归京辇?深々评々此[々],有限,不由披冀,但增悲恋。谨因使不宣。谨状。”^①

此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将此段标点略作改动:

“他乡万里,知我者希,惟二三贤不离心目。加以闻承,不奉音耗,西路抄贼,相伋严答,雪寒山闭,途绝进退,仿佛改年,不知何当得归京辇?深々评々此[々],有限,不由披冀,但增悲恋。谨因使不宣。谨状。”^②

其中的“相伋严答”的语义,校记中没有说明。

如果参考《书仪镜》乙本,这段文书的语义可以更加明白。“深々评々此[々]”,参照乙本当校作“深々许々此々”;同时录文中的“答”字应当校为“冬”字,如此则文书前后内容便通顺了,下面我们做具体论述。

《书仪镜》中信的结尾和“答书”之前通常有较明显的套语,即以“谨状”、“因使谨此不代”一类的客套用语结束。答书的开头都有问候语,如“忽辱芳问,用慰悬情”、“奉书为慰”等等。如:《书仪镜》甲本第54行:“公务草草,未及拜贺,先状不代。谨状。 答书 忽辱芳问,用慰悬情。”第66~67行:“人信之次,希绝知闻,当就助慰,未间多悵係,因使谨此不代。 答书 奉书为慰,愚子纳微。”敦煌书仪非常重视朋友间互相的寒暄、问候,其用语已成范式,不可缺少。反观《书仪镜·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这段书仪中“答”字前后的内容不具备此特点,因此甲本中的“答”当是误抄。

以上是从书仪的格式和体例上讲,其实仔细阅读这段文字,会发现“答”字前后的内容应该是同一个人在陈述自身境况。如今我们参校抄写较优的乙本,发现文中此字模糊不清。根据上文的推测,甲本抄写过程中参照了乙本,我们在此将甲本与乙本中“答”字的情况做一对比:

甲本



乙本



据乙本,我们很难确定这是何字,如果甲本抄写此字时参考了乙本,那么此“答”字则很有可能是抄手在抄写过程中臆断妄补所致。根据乙本此处残字的抄写情况和书信的内容,我们怀疑此处“答”字应该做“冬”字,原文即“加以闻丞,不奉音耗,西路抄贼相仍,严冬雪寒山闭,途绝进退,仿佛改年,不知何当得归京辇?”这样书仪前后文内容通顺,可以连为一篇书仪。

①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268页。

②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第57页。

唐初的《朋友书仪》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编排的,内容是叙节候景物与朋友之情的书信范文。从书仪的语言特点看,杜友晋编撰的《书仪镜》中节气景致、问候寒暄的内容受到唐前期书仪的影响,其中许多表节候、情感等的词语,如“暄和”、“炎凉”、“晦朔”、“不殊”、“不审”、“劳企”等等,是来自于《朋友书仪》中的常用语,如:“月……云频移晦朔”、“愬而言之云……屡改炎凉”、“孟春渐热,不审体内如何”、“边城节气,春风不殊”、“披诚敬想,企望成劳”^①。此外《书仪镜》中书札用语还有直接来源于晋代书札的,而于《朋友书仪》中未见。如“辱书”、“损书”之类的用法,即见于晋刘琨《答卢湛诗并书》:“琨顿首:损书及诗,备辛酸之苦言,畅经通之远旨。”^②

从内容上看,《书仪镜》的内涵远超《朋友书仪》,除了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书仪镜》还包括诸如官场之间、亲戚好友之间的往来信札,以及适用于各类场合下的吉仪和凶仪等。通过敦煌本《书仪镜》与《朋友书仪》的对比,可以看出唐代书仪由齐梁时期朋友间的书札发展而来,书仪的内涵不断扩大,由以朋友间往来书札为主的朋友书仪,发展至包含各种场合往还书札的综合类书仪。此外,南北朝时代书札主要适用于世家大族,而发展至《书仪镜》,书仪的应用范围已经转变为以官场为主、兼包各种场合下的书信仪,这体现了唐代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过渡的趋势和唐代庶民社会的发展。至晚唐时期,藩镇政治形成,专门用于官场交往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大量产生,《书仪镜》这种以官场交往内容为主的书仪,也体现出唐代综合类书仪向晚唐“表状笺启类书仪”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也是书仪实用性的体现,即随着适用对象的不同,其内容与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唐代书仪始终朝着综合性、实用性的趋势发展,《书仪境》内涵丰富,既保存了唐前期《朋友书仪》节候用语的一些形式,又可以反映出有唐一代书仪的特征。

《书仪镜》在史籍中未见著录,据周一良先生考证,唐人书中有以“镜”为名的,如《新唐书·艺文志》有萧嵩《开元礼义镜》一百卷,“镜”字有一览的意思,可能即纂要或简本之称^③。赵和平先生据《书仪镜》注文中“相国、左右丞相、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六尚书、三公九卿、节度使、太守同”,认为“相国”与“左右丞相”并列,其中“左右丞相”乃是尚书左右仆射在开元年代的称谓。另外书仪中多次出现“豫”字,代宗李豫即位于宝应元年(768)。因此推断书仪的创作年代大约在开元初年至乾元元年(768)。将 S.329+S.361《书仪镜》与

①参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73-111页。

②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69页。

③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P.3849《新定书仪镜》相对照,其凶仪部分完全相同,且《新定书仪镜》尾题“《新定书仪镜》吉上凶下京兆杜友晋撰”,据此赵和平先生认为《书仪镜》的作者为杜友晋,是开元、天宝时代的人^①。荣新江先生据书仪中“见到四镇”、“勃律小蕃,灭亡在即”、“马麟”等内容认为“四镇”即安西四镇,并推测《书仪镜》是“一部天宝六至十四年间安西四镇节度使麾下掌书记一类的官员编纂的《安西书仪》。”^②吴丽娱先生认为“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的“二兄”、“二郎”指的是天宝十二年平大勃律的封常清,《书仪镜》成书年代是天宝末年或更晚^③。张小艳先生的观点与赵和平一致^④。杜友晋,《新唐志》、《宋志》著录作“杜有晋”,敦煌写本中皆作“杜友晋”,王重民先生认为“书目作‘有晋’者,疑《宋志》因《唐志》之误而误。”^⑤敦煌书仪中P.3442《吉凶书仪》、P.3849《新定书仪镜》书题中即写有“京兆杜友晋撰”,可以确知为他的作品。从内容上看,《书仪镜》是P.3442《吉凶书仪》的简本或缩写本,《书仪镜》与《新定书仪镜》的吉仪部分区别较大但凶仪部分完全相同。关于《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的关系,赵和平先生、黄亮文先生已经做了相关研究^⑥,此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S.9713+S.329+S.361《书仪境》写本是西北地区的版本,但其内容应是改编自中原地区版本的《书仪境》,《书仪境》中原版本的作者应为杜友晋,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当时社会也只有出于京兆杜氏这样的大族名士,才有能力编撰一部通行于士庶间的书札礼仪的规范,也正因为出自威望地位高的大族之手,书仪才有可能广泛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其二,敦煌本《杜友晋吉凶书仪》以及《新定书仪镜》已经确知为杜友晋所作,《书仪镜》的内容与两者同出一源。《书仪镜》不同的版本只是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编而产生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书仪镜》S.6111+S.10595与S.9713+S.329+S.361的抄写关系也应当属于此种情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①赵和平:《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65-69页。

②荣新江:《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267-273页。

③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2页。

④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页。

⑤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225页。

⑥杜海:《敦煌书仪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第113-123页。